

21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本专栏特约主持人 夏康达(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文学系首席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名誉副会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不仅著作等身,其创作经历还颇多传奇色彩。1956年他的成名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反右”时被批为“毒草”,1979年重见天日,成为“重放的鲜花”;他于60年代创作的《这边风景》,1978年杀青时,已经风云突变,当时未能出版,却在尘封40年之后,高调推出,堪称“晚开的鲜花”,成为去年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受到热捧,但旋即便有不同的声音。本期专栏刊发的评论文章,只是其中的一种观点,发表于此,以为活跃评论气氛。古远清教授的《新世纪台湾两大政党文艺政策剖析》是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台湾文学史论”的阶段成果,供对台湾文学近况有兴趣的同志进行研究时作参考。

新世纪台湾两大政党文艺政策剖析

古 远 清

摘 要:新世纪民进党“去中国化”的文艺政策和国民党不再“以党领政”的文艺政策,尽管在具体政策的走向上南辕北辙,但就希望文艺为巩固政权尤其是为选举服务、政策不是以文件形式下达这两点来说,是相同的。文学年鉴的编纂是文艺政策的隐性体现,成为各政党“争夺”的舆论阵地。这些不同色彩的年鉴见证了台湾文学的发展变化,并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为后人研究台湾文学打下了丰厚的基础。

关键词:新世纪;台湾文学;民进党;国民党

文学组织制度,主要是指执政党制定的文艺政策,文学年鉴的编纂是文艺政策的隐性体现。新世纪民进党、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尽管南辕北辙,但就希望文艺为巩固政权尤其是为选举服务、政策不是以文件形式下达这两点来说,是相同的。

一、民进党“去中国化”的文艺政策

台湾文学一直与当代社会政治紧密相连。无论是民进党自2000年上台后执政8年,还是国民党自2008年重新执政以来,无不通过有形或无形的文化或文艺政策措施来制约文学的发展。

2011年9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办公室发布第四部竞选影片《读经篇》,画面以孔庙读

经班为主要内容,叙述读经班如何从大陆到台湾扎根的过程,其目的是在台湾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民进党知道后立即进行抨击,该党发言人诬称马英九是在向中国古代皇帝学习“独尊儒教”,希望马英九不要重蹈中国文化至上、打压本土文化的覆辙。^[1]可见,台湾两大政党的文化政策是如此水火不容。

民进党文化政策的贯彻分两个阶段进行。在取得政权前,他们的文化政策致力于宣传、催生“独立的台湾国民意识”。为了让这种意识尽快产生,他们采取了“亡人之国,先亡其史”的做法。在史书方面,最早有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在文学上,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2]和彭瑞金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3]和其遥相呼应。叶、

收稿日期:2013-1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ZW120)。

作者简介:古远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 430070)新闻学院教授,台港文学研究所所长。

彭所著的两本书,都不同程度地强调台湾文学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史纲”虽然出现过“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中国抗战文学的一部分”的语句,以及有台湾文学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是“在台湾的中国人所创造的文学”的表述,不过这都是言不由衷的表面文章。一到政治气候适合时,如2000年11月出版由中岛利郎和泽井律之合译的《台湾文学史》,在去掉书名“纲”字的同时,这些论述被作者本人删得一干二净,并对以陈映真为代表的有强烈中国民族主义倾向的《文季》系统作家“采取了否定性的处理方式”[4](P271-272)。

民进党取得政权后,其文化政策从催生“独立的台湾国民意识”转向巩固“台独意识”。[5](P13)为此,他们在政治上推动“公投、正名、制宪”,在文化上采取“去蒋化、去国民党化、去中国化”的措施,将叶石涛当年讲的“台湾意识”转化为“台湾独立认同”。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5月陈水扁在就职演说中首次提出“台湾文化”的概念。他讲的“台湾文化”,是一种与大陆完全对立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诚然是台湾文化的重要特征,但过分夸大和鼓吹这种文化,其目的是为了建立所谓的“海洋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陈水扁在文化上采取了如下做法。

1. 任命“台独”人士杜正胜为“教育部长”,将“台湾主体性”列为“四大教育施政纲领”,修改中小学教科书,美化荷兰、日本等对台湾的侵略,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剥离出来。

2. 沿着“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中华民国变台湾”的思路,把1949年后的“中华民国史”当作“台湾史”。

3. 让大专学校师生把中国文学视为“外来文学”,企图将其与“外国文学系”合并。

4. 公务员考试不是用国语而是以闽南语命题,初等考试中“本国史地”的命题范围不包含神州大地而专指“台澎金马”。

5. 把“乡土文学”、“本土文学”改造为具有特殊政治含义的“台湾文学”,用“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取代汉语拼音。

6. 清除象征中国的各种标志、符号、图案和名称,如企图把“中国文艺协会”、“中国妇女写作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的“中国”二字改掉或转换成“台湾”(后受到会员们的抵制未能实现)。

7. 每逢全台有重大选举,陈水扁必撕裂族群,

操弄“爱台”、“卖台”、“台湾人VS中国人”的议题,不少绿营作家均用自己创作的诗文参与这种打压中国意识的竞选文宣工作。

在民进党执政的8年中,多数文艺界人士不被理睬,少数被理睬的主要不是看中其文艺成就,而是因为他们赞同陈水扁的台独路线,以致“政治正确”的作家被封为“总统府资政”和“总统府国策顾问”。这些赞同陈水扁台独路线的绿营作家,为配合民进党的台独文艺政策,作品均突显“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两岸互不隶属”及“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主旨,如李敏勇的《诗人的忧郁》。李乔的《文化·台湾文化·新国家》等论著,不仅鼓吹“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割裂,还把两岸说成是“异己关系”,将“中华民国”定位为华人“国家”,而不再是“中国人”的“国家”。

文艺政策作为政府部门的一种措施,根本无法摆脱政治。多年来,人们把文艺政策看成是政府行为,属政治现象;对于文艺政策的研究,也多从文艺政治学的角度切入。民进党为了更好地掩盖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争取到中间群众,有时改用语言角度去贯彻自己的文艺政策,具体说来是把台湾文学等同于母语文学。为了使母语文学后继有人,在教育体制上强调多元文化和本土文学。至于母语教学,从小学生做起,每周要求他们学河洛语即闽南语、客家语,原住民语言因庞杂且使用人数极有限,请不到老师只好放弃。这无疑增加了学生们的课业负担,当然也收不到显著效果。因为这项母语教学计划只是民进党文化政策的一场政治秀,目的在于建立与大陆不同的语文系统,即用“华人”取代“中国人”,用“台语”取代“汉语”,为未来的“独立建国”铺平道路。然而,政治口号喊得震天响不等于教学方案的落实,且不说母语教材奇缺,就是有也不统一,单说师资严重不足又没有相应的培训机构,教材研发、经费等配套设施也跟不上,只好任其自生自灭。如此不负责任,是民进党文化政策的一大败笔。

号称鼓励作家自由创作的民进党,其文艺政策不会用典范的文本发布,而是用领导人的演说或代表执政党政治主张的“总统府资政”的讲话及相关著述来表达。这些讲话和著述离不开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是“两国文学”的陈词滥调,但由于它代表了“扁政权”的声音,所论辩的也是台湾文艺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同样具有文艺政策的意义。

所谓的“本土文学”,是深绿人士的另一个“独

立”法宝。叶石涛曾借评“本土文学”的代表钟肇政的小说时宣称：台湾人“认同自己是汉人不等于认同是中国人”，“光复时的台湾人原本有热烈的意愿重新回到‘祖国’怀抱的，可惜从中国来的统治者轻视台湾人，摧毁了台湾人美好的固有的伦理，使台湾人再沦为‘同胞’的奴隶，这动摇了台湾人原本有的认同感，使得台湾人离心离德以至于为生存而不得不起义抗暴，‘二二八’于焉发生”，于是，“认同感”彻底破灭。^{[5](P26)}这种观点，作为“总统府资政”的叶氏在新世纪也反复讲过多次。这和李登辉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以及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是完全一致的。叶石涛从文学论述走向文宣说教，把自己的立场紧紧向民进党乃至建国党的文化政策靠拢，完全取代了文学批评的意义，把自己捆绑在政治战车上，和他自己反对过的 50 年代出现的“反共文学”体现出惊人的同质性。

民进党执政前后权威人士讲话的发表即准文艺政策的出现，是一种特殊现象。它之所以成为“非典型”文艺政策，是因为民进党从不认为文艺可以接受检查、压迫或辅导，故他们极少制定文艺政策，而改用权威人士的讲话内容去代表民进党的政治主张和立场，或者说让他们的发声对执政党无形的文艺政策作发挥和补充。正因如此，叶石涛的讲话均被其追随者作为文艺政策去贯彻，也比来自官方由外行起草的文艺政策文本更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在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上，民进党认为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种指导思想使其文化政策离不开“反共”和“反中”这两条。2008 年 8 月北京举行奥运会时，绿营人士害怕盛大的京奥会增强台湾人民认同祖国大陆的信心，松动民进党多年经营的中国“侵略台湾”或企图“吞并台湾”的意识，于是先把北京的奥运会污名为“纳粹奥运”，并把中共领导人抹黑为“粉饰太平”的“纳粹领袖”。正是根据这种思维方式，民进党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彭瑞金多次把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工作者说成“文学恐龙”，说他们写的台湾文学史是编造出来的“龙的神话”，并点名批评刘登翰主编的两卷本《台湾文学史》“展现出没有丝毫遮掩愧疚的文化侵略霸权赤裸裸的嘴脸，要吞并台湾文学史”^{[6](P29)}。这里把正常的、平等的文化文流说成是“文化侵略”，把整合分流的两岸文学歪曲为“吞并台湾文学”，除暴露其心虚外，也说明他们是如此排外和夜郎自大。

无论是叶石涛还是彭瑞金的文章或讲话，虽

然具有文艺政策的权威性，但毕竟不是以文件的形式下达，缺少了文艺政策的应有程序和合法性，因而导致深绿和浅绿人士在理解上的分歧。

二、不再“以党领政”的国民党文艺政策

无论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国家文艺的发展，均与执政党所奉行的文艺政策有密切的关系。五六十年代台湾地区文艺的发展，就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文艺政策”息息相关。国民党的文艺政策，从共时性角度看，其内容充满内在紧张又复杂多变；从历时性角度看，则由于受不同党领袖的影响而有一个蜕变过程。

国民党迁台后的文化政策，源头来自蒋氏父子统治时期。在戒严期间，国民党一直以“中华文化的正统代表”自居，并于 1967 年发动了以“增强民族认同，培养民族自信心”为宗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文艺方面，国民党吸取过去有文艺政策而落实不力导致失去民心从而丢掉大陆的教训，在 1950 年代制定了以“反共抗俄”和“战斗文艺”为主要内容的文艺政策，并通过由蒋经国领导的隶属于“国防部”的“总政治部”和由张道藩出面组织的“中国文艺协会”两个系统贯彻。这些受到自由派作家的抵制，他们反对用文艺政策去制约创作。胡适说：“文学这东西不能由政府来辅导，更不能够由政府来指导。”^[7]乡土文学在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兴起，使国民党文艺体制的建构尤其是“展开反共文艺战斗工作实施方案”迅速式微。1981 年，“行政院”下属的文化专责机构——“文化建设委员会”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结束了过去以党领政，以党决定文艺政策的时代”^[8]。具体来说，国民党主导意识形态的“文工会”下设的“中央文艺理论指导小组”，在本土化浪潮冲击下已无法“指导”，只好将过去查扣期刊、出版物的消极作为和召开“全国文艺会谈”达到控制舆论的做法，改成为作家服务为主。

李登辉主政时，文化政策前后有所不同。1996 年以前，李基本上继承蒋氏父子以“中华文化的正统代表”自居的文化政策，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骄傲和精神支柱”，甚至还提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口号。^[8]后来，李在政治上不再认同大陆是祖国的一部分，强调本土化、台湾化，在教育和文艺领域开始刮“去中国化”之风，为“台独”思潮泛滥培育

了温床。

90年代本是多元共生的时代,随着台湾经济体制和两岸关系的变化,原由蒋介石的亲信张道藩制定的文艺政策早已名存实亡。基于这种情况,他们不再视文艺为一种教化或规训,不再迷信权力的制度化形式。为避免让人从政策中直接联想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便进入了缺乏具体文艺政策无为而治的时代。即是说,与时俱进的国民党不再像50年代那样去起草“现阶段的文艺政策”,其文艺主张通常不以文件的形式下达,而主要通过领导人的讲话进行宣传和实施。

2000年台湾首次实行政党轮替,国民党下野,后于2008年重新执政,开始回归被民进党遗弃的中华文化。马英九还在当台北市市长时,就非常重视文化工作,在全岛市县中首设文化局。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在其竞选过程中也提出详尽的文化政见,希望台湾能真正做到文化立“国”,希望用文化来深耕台湾,用软实力来面对世界。他明确将台湾文化定性为“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9],即认为台湾文化属中华文化之一种,它不同于大陆任何省市,是一种逐渐发展出“自身特色”的文化。“它的根来自中华故土,但是在台湾却落地生根,枝繁叶茂。”^{[10](P29)}马英九的《政治和行政要为文化服务》这篇讲话,可视为准文艺政策文本,这和蒋介石《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有同等意义。

民进党曾将“中华文化复兴总会”改为“国家文化总会”,马英九执政后再把“中华”二字补回,还一度亲自兼任“中华文化总会”会长。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以“中华”为本位的有特色的台湾文化,马英九通过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 调整中文译音政策,将陈水扁时期强行通过的通用拼音重新改为汉语拼音。

2. 将被陈水扁去掉的包含“中国”二字的单位名称予以恢复。

3. 重新审定教科书,增加中国史的教育内容。

4. 恢复祭孔活动,开创遥祭炎黄始祖的先例。

5. 提倡文字“识正书简”。

6. 鼓励两岸民间合作编撰中华语言文字书。

7. 力推开放陆生入台就读和大陆学历采认等。^[11]

马英九政见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海峡两岸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尤其是在威权的年代,文学很多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是我在当台北市长的时

候就提出一个观念,现在要倒过来,政治和行政要为文化服务,要为文化界排除障碍,让它有更广阔的空间,这个是我们政治人物应该做的。”^{[10](P24)}政治为文化服务,是一个崭新的文化观念,也是国民党文化政策大逆转的一个信号。它表明重新执政的国民党,对文化和文学界是重视的,而这正是刚从“绿地”中走过来的文化人特别关心和期望的。为不使这些人失望和贯彻“政治为文化服务”这一主张,国民党在新世纪对文艺采取了如下措施。

1. 成立“文化部”,任命著名作家龙应台为首任“部长”。这个部门的成立,撑开了文化格局,让文化更兴旺,文化人更有用武之地,从而深化了两岸文学交流的密度、深度与广度。

2. 台湾文学馆历任馆长均是绿营人士。马英九执政后,改派中央大学的李瑞腾当馆长,这意味着“蓝营”重新夺回台湾文学的诠释权。不过,文学馆毕竟设在南部。鉴于本土势力强大,新馆长还得和“绿营”妥协,否则工作无法开展。

3. 民进党执政后,台湾文学年鉴的编撰不再由原属国民党文工会管辖的《文讯》杂志负责,改由绿营控制的静宜大学中文系接手,于是“年鉴”色彩由泛蓝转为泛绿。从2009年起,台湾文学年鉴的主编权重新回到蓝营人士李瑞腾手中。

4. “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自2008年起颁发“国家文艺奖”以肯定文艺工作者,并将奖金提高至100万台币。为了延续这些得奖者的理念与事迹,有关部门致力于出版得奖者传记。“中国文艺协会”、“中国妇女写作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等组织的名称则保持不变,并尽可能让其发展壮大。

5. 坚持用中文写作,不赞成全面使用“台语”,更不同意只有用“台语”写作的文学才是台湾文学的观点。

作为马英九时代文艺政策掌门人的龙应台,完全不同于50年代的政客张道藩。她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却有显赫的文学创作成绩。她不靠政治背景,不依文艺政策的条文办事,不与官方拉关系,而靠自己的能力打开文艺局面。但限于其“外来”——从国外、境外回归台湾的背景,对台湾文艺了解不够深,并在超越蓝、绿两方面做得极不理想,因而常受到两派的攻击。作为一位文艺内行者,龙应台每天面对民众的不满情绪,毕竟心情沉重,好像戴着头盔要去当兵,或者是高空跳水。可以预料,官运亨通的龙应台一旦在“地雷阵”中跳

“芭蕾舞”提前“阵亡”后,重新和文学“复婚”也就指日可待了。

三、由“台湾的文学年鉴”到“台湾文学的年鉴”

在台湾当代文学史上,“文学年鉴”的编写出现了政党轮替总编也跟着轮替这一怪现象。年鉴本以客观地展览史料为宗旨,属“在场实录”的工具书,是活生生的文学编年史。它之所以成为各政党“争夺”的舆论阵地,是因为用什么文艺政策去“编年”和定位台湾文学,用什么观点去选择资料,在编排中如何突出编者的意识形态,在栏目设置上如何反映编者的态度,均大有文章可做。

台湾出版的文学年鉴经历了名称由“中国”、“中华”到“台湾”,由“文艺年鉴”到“文学年鉴”,由民间制作到官方主持的变化过程。作为台湾地区文学年鉴的开拓者柏杨,他主编了《1966年中国文艺年鉴》和《1967年中国文艺年鉴》。第一本不限于记录当年的文学活动,在时间上有所推前。后来柏杨坐牢,于1982年出狱后不改其为台湾文学写史的雄心壮志,又出版了《1980年中华民国文学年鉴》。在史无前例的艰难处境和自筹经费的情况下,柏杨用他坚韧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和写作经验,为台湾文学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由于后继乏人,再加上经费和发行的困难,台湾文学年鉴的编写工作停顿了14年。一直到“文建会”于1996年委托《文讯》杂志社编辑《1996年台湾文学年鉴》时,柏杨的工作才得到了传承。

从创刊起就受国民党文艺政策支配的《文讯》杂志,并没有发展成为国民党“背书”的“机关刊物”,而是十分注重文坛史料积累,并建立了一支有丰富编辑经验的团队,尤其是主事者李瑞腾和封德屏均是文学素养深厚、很有事业心和奉献精神作家。他们在20世纪总共编了1996年—1999年四大册。这些年鉴每年的栏目虽有不同,如1997年年鉴的“综述”扩充为15篇,1998年年鉴又增加了“索引”部分,但基本上大同小异。这说明《文讯》编辑团队确立了年鉴的编写规模和范式,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当年的台湾文学活动,其交出的成绩单令各界称赞。

2000年国民党丢失政权,这正好给人们重新思考台湾文学的定位、功用和政府部门在文学中应扮演什么角色提供了机会。可由于民进党缺乏执政经验,对于文艺的管理完全外行,因而只好把

年鉴的编辑工作推向社会,用招标的方式制作。《文讯》本来最有资格参加竞标,但由于该杂志社当年隶属于国民党“文工会”,再加上他们不愿意为民进党工作,因而由前瞻公关公司中标。《2000年台湾文学年鉴》由前瞻公关公司委任诗人杜十三担任总策划,白灵、须文蔚、杨树清、陈文发、郑珍、林德俊、陈静玮分别担任评论、网络、采访、摄影、美术、编辑、资料各组的主编。别看他们是赢利团体,可并没有忘记意识形态,主持人杜十三及其好友白灵均具有强烈的中国意识。他们不受任何政党文艺政策的羁绊,把中国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留在书中,其编撰的年鉴比《文讯》版更富有中国性。如“网路文学”这一项目中,居然给遥光主持的“传统中国文学”网站作图文并茂的介绍,并突出其“国学知识传播”这一特点。“著作”这一大项目中,也出现了详尽的“中国古典文学论著书目”。那里不仅有“通论”,而且还有辞赋、散文、诗、词、戏曲、小说、俗文学,其展览性的介绍让人误以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部分的同时,“‘中国文学’也是‘台湾文学’的一部分”^{[12](P161)}。该年鉴第一部分“综述”的打头文章是南方朔写的《“全球化”时代走向“世界文学”》,难怪有位读者看了这篇文章尤其开头第一句话“2000年对台湾文学最具警示性与挑战性的……”后,“还真以为正在看的是《2000年中国文艺年鉴(台湾地区部分)》或《2000年台湾地区中文(华文)文学年鉴》呢!”^{[12](P161)}

《2000年台湾文学年鉴》由综述、记事、人物、著作、作品、名录、网路文学七大部分组成,其中“网路文学”是《文讯》版所没有的。该书长达550页,在厚度上比过去多出两倍多。由于此年鉴是转型期的产物,且带有实验性质,故引起不少人的不满和批评。最先由本土派的《台湾日报》发难,后有《民生报》、香港《明报月刊》及由杨宗翰主编的台湾文学研究丛刊《台湾文学史的省思》^[12]参与。批评除涉及年鉴的意识形态色彩外,另有史料上的硬伤,如第520页所记载的“战后五十年台湾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0年召开,其实是于1999年举行的。这个重要会议发表的论文有20多篇,仅刊出6篇的题目,遗漏甚多。

年鉴最重要的是客观地反映当年的文学活动,其资料必须翔实可靠,而不能用意识形态去剪裁,用政党的立场去诠释。静宜大学中文系自2002年夏天接手编撰从2001年开始的年鉴后,

在总策划郑邦镇、总编辑彭瑞金这两位绿营人士的引导下,把“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带到年鉴中。如2011年年鉴中邱若山写的《〈台湾论〉汉译本事件》一文,明显地站在亲日派一边,所谓“亲中人士”不是被耻笑就是被抨击。在2002年年鉴中彭瑞金写的《从“乡土文学”到“台湾文学”》一文中,多次点名批判联合报系,强烈反对把“他们认可的‘乡土文学’从‘台湾文学’割裂开来,其余的全部划归‘中国文学’”^{[13](P62)}。这是一篇具有很强攻击性的“檄文”,违背了工具书的宗旨。郑邦镇的《回首“台湾文学系”的来时路》^{[13](P66)},对“教育部”不同意设立台湾文学系,不同意静宜大学中文系将“台湾文学”独立出来分组的做法,充满一片讨伐之声,还挖空心思将此命名为政治性的“台湾文学228”。由这两位年鉴负责人的爆破型而非建设型文章可看出,台湾文学年鉴已蜕变为绿营建构台湾文学主体性、“独立性”的工具。

文学年鉴的制作需要纯学术的态度,可在选举的喇叭声干扰下,学问不可能不与政党的意识形态挂钩。以《2002年台湾文学年鉴》为例,在栏目安排上一味突出“台湾”而拒排中国。文集栏目所开列的作家,绝大部分是本土人士,如钟肇政、李魁贤、詹冰、张文环、叶荣钟、王雄、周金波、李荣春等人,外省作家只有纪弦、朱西宁两位。这就是说,具有中国意识的作家在彭瑞金主编的年鉴里,已被迅速边缘化。

从《文讯》版年鉴到静宜版年鉴,因主编立场不同带来意识形态色彩的不同,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李瑞腾主编的年鉴是“台湾的文学年鉴”,那么,彭瑞金主编的年鉴就是“台湾文学的年鉴”。前者的“台湾”是中性名词,“台湾的文学”可以指台湾地区文学,也可以指“中华民国文学”,是国民党不愿完全放弃“中华”二字文艺政策的体现。为落实这一文艺政策,年鉴的任务是把凡是发生或出现在台湾的文学现象、文学活动、文学社团、文学生产、文学人物、文学教研,不分族群、不分省籍地记录在案。而“台湾文学的年鉴”,所突出的是“台湾”二字,如把台湾文学定位为与“中华文学”或“中国文学”无关的本土作家写的作品,而外省

人写的不包括在内。故民进党文艺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彭瑞金接手年鉴的编纂后,按照民进党“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大刀阔斧砍去所谓“在台湾的非台湾文学活动”,大陆赴台作家的动向由此在年鉴中被大面积缩水,最多是聊备一格。尽管《文讯》版年鉴、静宜版年鉴都难于窥见政党直接介入、文艺政策直接干预的痕迹,但从2001年至2008年年鉴的执笔者大部分是亲绿人士,不难看出他们对文学的陈述与再现、对作家的分类与选择,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当然,静宜版年鉴也有不少值得肯定之处:注重培育新生力量和“年鉴学”的建立,并将其推向大学讲坛,在内容上注意强化教科书的本土化以及原住民文学观察、“台语文学”的书写,在书后还配有光盘,这都有利于台湾文学的推广。

彭瑞金在《从台湾的文学年鉴到台湾文学的年鉴》中说:“在年鉴编制的过程中,我们听到这样的质疑声音:‘台湾文学年鉴’到底应该定位为‘台湾的文学年鉴’还是‘台湾文学的年鉴’?”^{[13](P4)}可彭瑞金他们对这种质疑没有进行反省,继续我行我素强调年鉴的“鉴识作用”,在鉴别什么是重要的人、重要的事、重要的出版品方面,明显偏向于本土作家。随着民进党下野,年鉴的主编也走马换人,“台湾的文学年鉴”掌舵人李瑞腾于2009年重新“夺回”年鉴的编辑权和出版权。在他的主导下,陈信元文章的标题《中国大陆对台湾文学研究概述》原封不动地登出,而不像同是这位作者和同一内容的文章,在2003年年鉴中“大陆”二字被勾掉,成了不伦不类的《中国地区对台湾文学研究概述》。在2009年以后的年鉴中,焦点人物也不再是以高扬台湾意识的作家为主,而让陈映真、黄春明、聂华苓、商禽、周梦蝶这些具有中国意识的作家占主要版面。

台湾文学年鉴尽管受政党文艺政策的潜在干扰,造成史实不够客观这一缺陷,但这些不同色彩的年鉴毕竟见证了台湾文学的发展变化,并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为后人研究台湾文学打下了丰厚的基础。使人感到遗憾的是,1967年以后和1996年以前的空缺至今还无人补上。

参考文献:

- [1] 王正方. 民进党的文化政策是什么? [EB/OL]. <http://www.huaxia.com/thpl/tdyh/wzf/2011/09/2601422.html>, 2011-09-27.
- [2] 叶石涛. 台湾文学史纲[M]. 高雄:文学界杂志社, 1987.
- [3] 彭瑞金. 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M]. 台北:自立晚报出版部, 1991.

- [4] 叶石涛. 台湾文学史(日文本)[M]. 东京:研文出版,2000.
- [5] 叶石涛. 展望台湾文学[C]. 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
- [6] 彭瑞金. 台湾文学史论集[M]. 高雄:春晖出版社,2006.
- [7] 胡适. 中国文艺复兴·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J]. 文坛,1958(2).
- [8] 封德屏. 国民党文艺政策及其实践(1928—1981)[D]. 新北:淡江大学,2009.
- [9] 刘兆玄. 中华文化是海峡两岸最大公约数[EB/OL]. <http://tw.people.com.cn>, 2012-09-09.
- [10] 郭枫. 文学百年飨宴——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论文集[C]. 台北:新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2011.
- [11] 杨立宪. 台湾社会对中华文化的态度探析[EB/OL]. <http://www.csscn.cn>,2012-08-24.
- [12] 杨宗翰. 台湾文学史的省思[C]. 永和:富春文化公司,2002.
- [13] 彭瑞金. 2002年台湾文学年鉴[Z]. 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3.

Literary and Artistic Policies Analysis of Taiwan's Two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in New Century

GU Yuanqing

Abstract: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literary and artistic policies analysis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and governing politics through the Party of the Kuomintang in new century reverse the directions. But it is the same for the hope on literary and artistic policies should be serviced for political power, especially for the elections, including policy is not issued in document form. The codification of literary yearbook reflect the literary policy is recessive, and became the public opinion compete among the political parties. These different colors yearbook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left a rich historical data for future generations of Taiwan literature. There are huge foundation for the Taiwanese literature researcher.

Key words: new century; Taiwan literature;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the Kuomintang

(上接第9页)

The Study on Ramesh K. Arora's Bureaucracy Research

TAN Rong

Abstract: Ramesh K. Arora, an Indian schola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ends to employ ecological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es in his studies. He concerns the bureaucracy studies of Max Weber and Fred W. Riggs, especially pays attention to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setting up theoretical framework when going on his own bureaucratic studies. He sums up the institutional study method from Max Weber's studie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ecological method and developmental administrative approach from Fred W. Riggs, offering researching perspectives based on "mode" and "focus" for compara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studies.

Key words: Ramesh K. Arora; bureaucracy; compara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ve ecological idea